

新时代中国式养老的内涵阐释

赵含宇 史亚龙

天津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天津 300450

摘要: 中国式养老实践以习总书记文化思想为指引, 探索出一条植根文化传统、回应时代需求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本文从“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出发, 阐释中国式养老如何推动养老目标从生存保障向全面发展跃升。在文化根基上, 以“两个结合”为核心, 构建了“家国同构、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在实践层面, 通过党建引领的协同治理体系, 创新养老服务模式, 并依托智慧养老、银发经济等新业态提升服务品质。中国式养老的文明意义在于, 为全球老龄化治理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展现了中华文明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智慧与价值。

关键词: 中国式养老; 人民至上; 两个结合; 制度自信; 文化使命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style Elderly Care in the New Era

Zhao Hanyu, Shi Yalo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rxist Academy, China Tianjin 300450

Abstract: Guided by President Xi's cultural philosophy, China's elderly care practices have charte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rooted in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responsive to contemporary needs. This paper, from the value stance of "people-centeredness," elucidates how Chinese-style elderly care promotes a leap from subsistence security to holistic development. Culturally, it establishes a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family-state integration and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centered on the "two integrations." Practically, through a Party-le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it innovates elderly care service models and enhances service quality by leveraging new formats such as smart elderly care and the silver economy. The civilization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style elderly care lies in providing a sol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global aging governance, demonstrating the wisdom and valu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Chinese-style elderly care; People-first principle; The two integrations; Institutional confidence; Cultural mission

0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基本国情。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截止到 2023 年末, 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超 2.96 亿, 约占总人口的 21.1%, 这意味着我国已全面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在“未富先老”的现实挑战下, 如何走出一条适宜的养老道路, 让老年人“优雅老去”成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与人民福祉的重大时代课题。本文立足于习总书记文化思想的宏大视域, 尝试论述中国式养老是以“现实的人”为根本立场, 以“两个结合”固本开新, 以道路自信彰显内在优势, 以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为目标愿景, 旨在构建一个植根自身文化传统、实现文明延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1 以“人民至上”锚定价值立场

人民至上是始终贯穿于习总书记文化思想中的一条鲜明的主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现实的人”为

价值基点, 彰显着实现老年人的“自我实现的转变”和养老供给的“发展型的转变”。

第一, 在发展目标上, 关注老年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坚持实现从服务的被动接受到价值再创造的转变。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 全体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中国式的养老服务实践中, 注重发展目标的转变是对老年人内在驱动和角色的重塑, 其独特之处在于对老年阶段价值的重新定义, 明确了老年阶段并非是人生发展的消退期, 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广大老年人资历深、阅历广、经验丰富, 不少老年人富有技术、业务专长。”因而, 中国式养老服务其深层目标应赋予老年人新的生命主体性, 为老年人创造机会、搭建平台和转变社会观念。所谓的老年阶段的生命主体性, 就是要重视发挥老年群体作用, 创造老年群体参与社会的渠道, 激发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 充分认可其社会价值, 将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有机结合起来。让老年人

从被赡养、被照顾的弱势群体逐渐转变成有价值、有尊严、被认可的生命主体,实现其全生命周期的全面发展,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

第二,在资源配置上,关注服务体系和内容,实现资源配置从生存型养老到发展型养老转变。“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要求养老工作必须精准对接老年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覆盖面显著扩大。但不可忽视的是,老年群体对高品质、可负担的普惠养老服务的迫切需求与我国“未富先老”的服务供给能力、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为了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强调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这一论述为破解上述矛盾、实现养老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性提供了根本遵循。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目标,其破解路径在于:一是筑牢公平底线。加快构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落到实处。二是提升供给品质。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普惠养老”等养老新业态新模式,有效扩大供给品种,致力于提供“数量足、质量优、品种多、效能高、安全性好、成本更低”的养老服务产品,推动养老服务业优化升级。三是促进资源均衡。在推动服务升级的同时,着力弥补农村地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特殊困难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短板,培育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主体,推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有效衔接,促进城乡区域间资源配置逐渐均衡。

2 以“两个结合”夯实文化根基

中国式养老的文化逻辑,本质上是“两个结合”在民生保障中的生动实践。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略必然深植于自身独特的文化土壤之中,积淀起中国式养老的家国文化逻辑。

中国式养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基于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家庭结构变迁、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实际,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探索和适应性建构,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养老发展道路。其一,面对“大国养老”的实际,催生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协同治理机制。促使养老责任主体从家庭走向社会,服务模式从单一走向多元,政策导向从普

适走向精准,实现了传统养老文化智慧在现代治理体系中的创造性转化。其二,结合我国家庭结构少子化、空巢化的社会实际,我国探索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旨在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更为连续、全面的养老服务体系,将养老服务网织得更加缜密牢固。其三,针对我国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实际,中国式养老探索出“分区、分类、分时段”的区域发展差异的精准策略。坚持实现养老资源向基层下沉,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与发展观与中国传统社会将“孝”视为“德之本”的理念高度契合。其内涵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能养”到“敬亲”的精神内核,体现了对“人”的本质的重视。古有《论语》记载“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与现代调查显示老人最看重的孝道是子女的陪伴,而非物质供给的孝道行为高度一致。这不仅是孝道的要求,更深层次上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性思想在养老领域的具体体现,奠定了中国式养老的文化底色、价值基础和资源禀赋。二是从“家孝”到“国忠”的伦理延展,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尊老敬老的传统不仅限于道德倡导,历代王朝大多将养老纳入国家制度。从汉武帝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奉为治国理政的最高准则、唐代的“悲田养病坊”、宋代的“福田院”到明清时期设立“养济院”等官方养老机构,正是认识到养老问题关乎社会稳定这一“社会存在”,“孝”才演变为连接个人修养与社会稳定的纽带,进而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彰显着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传统文化渊源。

3 以“制度自信”彰显治理优势

坚定道路自信,要求我们从制度效能与治理体系的双重维度,厘清中国式养老区别于西欧福利国家的内在优势。它既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亦不是其他国家养老事业的翻版,而是基于中华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治理理念的主动建构。

中国式养老坚持统筹治理与持久正义,集中体现为党组织领导下的资源整合效能与发展成果共享的制度优势。例如,邯郸市邯山区通过养老服务联席会议制度,将市场监管、医疗保障、应急管理等部门의 职能“打包”,进一步打破部门壁垒;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能够有效克服“政出多门”的治理困境。中国通过长期护理保险试点、适老化改造补贴等举措,持续推动养老资源

向农村、低收入群体倾斜。

随着老龄化加速和少子化加剧,众多“80、90后”独生子女成为“夹心层”,我国家庭结构趋向“421倒金字塔”结构模式,即一对夫妻需要抚养一个孩子和赡养四位老人,传统意义上的“养儿防老”“轮流赡养”等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2024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快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这一供给格局通过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将医疗护理、康复训练等转化程度高的正式照护,延伸至老年人最熟悉的家庭和社区领域。这既保障了基本养老服务的普惠性、兜底性,又满足了老年“养老不离家”的朴素需求,同时将子女的精力从繁重护理转向高质量陪伴,为“夹心层”的子女松了绑。在这一模式下,不同经济状况和照护需求的老年人都能获得有温度、个性化的养老服务,两者实现基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较好平衡。

4 以“文化使命”明确发展航线

坚持以科技赋能,打造智慧养老新体验。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激活传统养老文化的关键杠杆,关键在于利用现代技术守护老年人的尊严、自主与情感需求。其一,建设智慧平台,实现养老服务资源供需双方高效对接。平台可以根据算法推荐设置适宜的传统文

化、智能生活、家庭理财等老年大学课程,让优质文化资源高效惠及每一位老人。其价值在于满足了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其二,应用智能设备,筑牢居家养老安全防线。以智能睡眠监测仪、运动健康手环、家庭服务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医疗健康设备正重塑养老服务的生产、提供、监管和体验方式。此类设备的应用为老年疾病的诊断、预防及监测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便于及时将老人的身体情况实时同步至子女手机端,能有效缓解居家养老监测难和机构养老成本高的痛点,实现了将子女从被动看护中解放出来,转向更高质量的情感交流与精神陪伴。

在养老领域肩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需要将尊老敬老爱老的文化哲学内化为社会集体的自觉行动,营造一个全方位的老年友好型文化氛围。其一,将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融入全学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大中小学通过主题班会、思政课、校园文化建设等形式,使学生领悟孝亲敬老的文化精髓;积极引导

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共建共享。鼓励社区自设老年教育学习点、社区图书馆、支持高等院校与社会组织等共建老年大学,为老人提供休闲娱乐、中医养生、军事科技、智能生活、反诈防骗等方面的学习教育活动,组织老年读书分享会、文艺演出、太极拳展演等文体活动,有效拓展其社会参与方式和精神生活维度,真正实现安享幸福晚年的美好愿景。其三,创新宣传与舆论引导。借助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将“健康老龄化”理念浸润到舆论宣传每个角落。聚焦老年人社会参与、老有所为的生动故事,展现老年人在社区治理、文化传承中的积极作用,助力形成尊老爱老的社会共识,为养老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5 文明意义:为全球老龄化贡献中国方案

健康长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追求。中国式养老的实践为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兼具东方智慧与普遍适用性的中国方案。它生动诠释了老年阶段并非文明的黄昏,而是人性光辉的又一次绽放;现代化的养老道路也并非只有单一模式,一条根植于本国文化传统、坚持以人为本的养老路径完全可行。

中国式养老的创新之处,在于超越了“要么国家全包、要么推向市场”的二元对立思维,探索出一条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多元主体协同共担的新路径。它注重平衡活力与秩序,在提升养老服务品质的同时坚守公平底线,实现了政府统筹力、市场配置效率与社会伦理作用的有机融合。在实践中,政府承担“保基本、兜底线”的主要责任,筑牢养老保障底线,确保所有老年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通过社会救助与福利补贴制度,对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实现精准兜底。在此基础上,积极培育银发经济,鼓励市场和社会力量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养老服务,既满足多层次需求,也避免了单一政府供给可能存在的效率不足与选择局限。通过发展智慧养老等新业态,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中国式养老注重发挥社区互助作用、通过“时间银行”等模式,推动形成代际互助的良性循环,不仅降低了养老的制度和情感成本,也增强了社会凝聚与治理韧性。

参考文献:

- [1] 谢培熙. 从家庭到机构: 养老文化认知差异与意外风险呈现[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39(01):94-104.
- [2] 谭秋霞, 钱继磊. 中华传统孝文化与家政养老服务

事业发展[J]. 山东社会科学, 2025,(03):154-161.

[3] 杨淑娥, 孙宝庆. 中国养老文化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出路[J]. 河北学刊, 2010,30(05):167-170.

[4] 杨一帆, 林洪平. 中国康养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 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025,(04):12-14.

[5] 李芳, 李朝晖. 子女外出比、“不在场”反哺途径与老年人数字融入[J]. 兰州学刊, 2025,(02):181-194.

基金项目: 2025 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研究专项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津派文化研究专项重点项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项目批准号: TJDZX04-1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赵含宇, 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博士。